学术评论

2024年清史研究综述

毛立平　邓　林

2024 年的清史研究延续了近年来“深耕传统议题、拓展新兴视角”的学术趋势，不仅围绕“大一统”观念的演化与边疆民族治理、清代中外关系的双向互动、基层社会管控的实践逻辑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探讨，还在史料运用、研究方法与议题拓展上呈现出新的学术气象——海内外珍稀文献的挖掘与整理、图像史料的实证运用、对微观群体的细致考察，以及全球史、数字人文等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为清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限于篇幅，本文很难全面总结与呈现该年度的所有研究成果，仅选取笔者认为最具代表性的 5 个方面来呈现该年度清史研究的动态与进展，总结研究特点与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些许参考与启示。

一、“大一统”观与边疆民族治理

清朝的“大一统”观可谓 2024 年度最受学界关注的议题之一。本年 8 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了“中国‘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将“大一统”观置于多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其历史演化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认同、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地方治理等核心议题，深化与扩展了“大一统”研究的内核与外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中国史研究动态》也于本年第 5 期推出“清王朝的继承性与大一统”笔谈，从不同角度梳理论证清代历史的继承性与“大一统”观。在此带动下，学界有关“大一统”的论文频出，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

（一）“大一统”观的形成与演变

围绕“大一统”观的形成与演变，学者们从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华夷之辨”观念的演变、“中国”概念的形成，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流等层面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杨念群从“大一统”与“正统论”之关系、清朝如何通过“大一统”观重建对“中国”的理解，以及“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大一统”之关联三个方面，阐释“大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的流变过程及其现代性意义，并对现代中国民族观的形成与“大一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做出新解释。[①] 成一农考察了清末从“大清”到“中国”的国号认知转变，指出清朝统驭“天下”，大清国对应现代“疆域”；“中国”除地理与政治属性外，还蕴含对“四夷”的优越性，是清朝统治合法性来源之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中国”逐步取代“大清”，完成从传统皇朝标识到现代国家名称

[作者简介]　毛立平（1974—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maolp@ruc.edu.cn；邓林（1999—　）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dlin316@163.com

① 杨念群：《“大一统”观的演化过程及其现代性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 年第 3 期。

的转变。[①] 刘文鹏指出，清代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在版图扩展、政治管理机制的稳定性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这一格局深化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保证了中国在文化上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势。清代在思想上突破了“华夷之辨”的限制，强化了“中国”意识，在与亚欧国家关系的处理方面也更加具有现代国家特征。[②] 朱浒、孙浩然指出清代实现、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程，是数千年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化的必然结果，展现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特定表达与实践逻辑。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双重维度观察清代国家统一，才能充分理解清代在中国认同驱动下对“大一统”观的继承、改造与实践。[③]

高波考察了北京从王朝边地转变为“天下之中”观念的形成过程，指出元明清时期北京为“天下之中”观念的确立，是理学、经学、数术与政治诸层面不同节奏演变的合力，其根源在于“大一统”自“中国一统”演进为“华夷一统”。[④] 邹建达指出“大一统”思想源于先秦，核心是构建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秩序，明朝继承传统“大一统”，却固守“华夷之辨”，清朝突破“华夷之辨”，构建“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新理念。[⑤] 刘正寅指出清代在皇太极时改国号大清，仿明制建政权，宣示继承中原正统，入关后依传统祭历代帝王，修《明史》，也是对正统的承绪，同时加强集权，倡满汉一体，将华夏认同上升为各民族集体认同。[⑥] 林枫指出清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以改土归流实现对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行汉化政策，边地农业进步与全国商业网络的构建则促进了各民族经济交融，使“中国”的概念扩展至广大边疆。[⑦]

除宏观论述之外，学者们还从经济、文化、礼法等角度对“大一统”思想的表达与实践进行阐释。李伯重指出，18 世纪边疆与内地省份相互作用，形成全国市场，是中国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人口剧增而耕地增加缓慢的 18 世纪，依靠斯密动力（市场规模越大，整合度越高，运作就越好），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⑧] 吴洋考察了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中显示的乾隆帝针对满汉群体的不同学术导向，指出不同导向实际上统一于乾隆帝的“同文之治”，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目的。[⑨] 贾安琪指出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强调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清朝统治者通过“礼制下移”与“官法同构”两种并行不悖的制度建构，引导基层社会形成符合官方倡导的伦理道德秩序。[⑩] 陈兆肆、王亮考察了乾隆帝对岳飞特加推崇的深层原因，指出乾隆时大一统基本底定，满汉矛盾趋于缓和，岳飞作为反清大纛的色彩已然淡化，乾隆帝意欲通过推崇岳飞为臣工深植忠孝纲常，强化疆域一统的“正统观”。[⑪]

（二）修教齐政：“大一统”观在边疆民族治理中的体现

“大一统”观在边疆民族治理中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因俗而治”与“修教齐政”之间的关系上，学者们围绕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

① 成一农：《从“大清”到“中国”——基于皇朝时期天下秩序的讨论》，《学术研究》2024 年第 8 期。

② 刘文鹏：《论清代历史地位》，《史学理论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③ 朱浒、孙浩然：《中华文明统一性特征在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以〈清代国家统一史〉为中心的探讨》，《清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④ 高波：《“天下之中”转移与元明清大一统演进》，《历史研究》2024 年第 8 期。

⑤ 邹建达：《明清两朝对传统“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 年第 5 期。

⑥ 刘正寅：《正统承绪与华夏认同：清朝大一统的建立与发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 年第 5 期。

⑦ 林枫：《继承·内化·光大：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铸就》，《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 年第 5 期。

⑧ 李伯重：《18 世纪中国的经济繁荣与全国市场的形成》，《中国史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⑨ 吴洋：《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

⑩ 贾安琪：《立法设教：清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合治”》，《社会科学》2024 年第 8 期。

⑪ 陈兆肆、王亮：《乾隆帝推崇岳飞考论》，《清史研究》2024 年第 5 期。

边疆民族政策中“大一统”观的宏观阐释。胡恒指出对于边疆地区，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在保持“大一统”的同时采用“因俗而治”的治理策略，但不可否认行政建置变革朝着郡县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历史上中国郡县体制向边疆地区不断拓展的一个缩影。① 吕文利梳理了清朝边疆治理思想从“因俗而治”到“修教齐政”的发展过程，指出清初以因俗而治的策略把边疆地区纳入版图，实现“大一统”格局，清中叶边疆日渐稳定，朝廷逐步谋划“修教齐政”之策，实现全国教化与治理的一体化。② 袁剑指出清朝边疆治理广度与深度空前，理解清朝边疆区域间的历史关联是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与疆域历史连续性的关键。理藩院是理解边疆区域间关联的核心，而清朝皇帝对山水景观的思维构建在思想层面强化了边疆区域间及边疆与内地的关联。③ 杨思机聚焦清末理藩院的转型过程，指出清末中央边政机构转型的核心是将理藩院向民族国家专职机关转变，以实现撤藩建省与大一统多民族主权国家重建。这一过程反映了近代边疆治理从多元转向一体化的趋势。④

“大一统”观在各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是考察这一观念实际作用与影响的重要途径。学界从行政建制、治理理念和思想文化等层面进行了详细阐释。

行政建制的演变是考察边疆治理中“大一统”观实践的重要内容。白京兰从法律的维度考察了新疆建省问题，指出晚清政府将边疆建省作为对内整合凝聚、对外塑造国际形象、重塑国家行政地理的重大改革，新疆成为晚清首个边疆省份及清朝第 19 省，体现出 19 世纪末近代中国追求更广泛的国家统一性的努力，并以此思考近代以来以“大一统”为指向的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的多样性。⑤ 吴轶群、王雪花考察了晚清南疆喀什噶尔道和阿克苏道的政区变迁，指出二道于光绪八年建置，是新疆建省的重要准备，也是国家政治制度在边疆不断深化的具体表现。⑥ 王乃丰梳理了嘉庆至光绪年间昌图从厅到府的转变过程，指出昌图升府采取州县制管理，使一系列社会问题显著改善，但这一过程中仍保留了原来蒙古王公的利益，反映出“因俗而治”与“修教齐政”的并行不悖。⑦ 谢长龙对清代东北厅制进行考察，指出东北是边疆设厅的典型案例，各省进程有别却遵循相似逻辑，最终促成一个完备的民人管理体系的形成。⑧ 江震关注清末吉林东部县级政区界线的变迁，指出在吉林东部设置县级政区是官方应对边疆危机、深化地域治理的重要措施。政区多以山川为界不仅出于垦务的便利，也是为了应对边事交涉、民务管理的需要。⑨

清朝通过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礼法建设，设立义仓、义学等公益机构，统合地方信仰等一系列举措，将国家势力和正统观念逐步渗透到边疆。赵卫宾指出收复新疆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官员在改置行省的同时，施行以礼治为核心的社会教化，程朱理学思想及其价值观念广泛传播，推动了新疆在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国家认同等领域与内地的一体化。⑩ 刘维栋考察了清前期准格尔旗内部案件审级制度的演变过程，指出审级的确立与变革是清朝治理蒙古二元管理体制的突破，也是准格尔旗在司法领域对藩部地区政治内地化与一体化趋势的因应。⑪ 高人雄通过

---

① 胡恒：《清朝的国家规模与空间治理逻辑初探》，《史学理论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② 吕文利：《论清代边疆治理》，《史学理论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③ 袁剑：《清朝边疆区域间的历史关联——基于思想与实践维度的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④ 杨思机：《清末民初中央边政机构的转型争议》，《学术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⑤ 白京兰：《法权伸张：晚清新疆建省的法律因素》，《西域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⑥ 吴轶群、王雪花：《治广以狭与人地相宜：晚清南疆二道政区变迁及基层职官的选任》，《历史地理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⑦ 王乃丰：《晚清昌图设治与边陲社会管理》，《历史档案》2024 年第 1 期。
⑧ 谢长龙：《清代东北厅制与驻防区民人管理初探》，《清史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⑨ 江震：《清末吉林东部县级政区界线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 年第 1 期。
⑩ 赵卫宾：《晚清新疆建省前后的礼治教化与社会影响》，《西域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⑪ 刘维栋：《清代沿边藩部的审级变动考察——以乾隆朝准格尔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 年第 1 期。

对一份清末新疆义学经费请销呈报的考察，指出义学经费以政府财政为主，各塾堂在启蒙教育中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与经堂争取教育主导地位作用重大，促进了民族文化融合，为清末新学奠定了基础。①杨一章、张莉聚焦吐鲁番的义仓，指出其始置于光绪十年，是传统仓储制度由内地向边疆的推广，吐鲁番义仓的官方主导性较强，成为整合地方社会、延伸国家力量的平台。②阿利亚·艾尼瓦尔聚焦清代新疆镇迪道的救灾实践，以清政府在自然灾害救济中的跨地域实践为背景，分析中原荒政体制和减灾文化在天山南北落地生根的一体化过程，揭示防灾减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铸造之间的紧密关联。③

除政治层面的考察外，“大一统”观也突出体现在文化与宗教信仰层面。武强聚焦清代新疆博格达山的“神山”信仰，指出当地以“神山”信仰及国家祭祀为基础形成了完整的人文景观叙事，反映出边疆与中原地区地理知识、治理体系的一体化进程。④邹立波考察了清初以来川藏道上的将军信仰传入青藏高原的过程，揭示川、滇等省在清代前期经略西藏过程中的地缘政治关系，以及兼纳藏、汉文化的信仰共享与不同身份奉祀群体的社会互动关系。⑤崔思朋聚焦清代以来蒙古草原上形成的庙会，指出呼伦贝尔地区于乾隆时兴建了甘珠尔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甘珠尔庙会促进了呼伦贝尔与周邻地区交流互动，加强了该地各民族间及与周邻地区间的联系，对清代北部边疆治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⑥

文化“大一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书写方面。张光耀聚焦 18–19 世纪蒙古草原史著，指出草原史著的历史书写与清代政治，特别是满蒙关系变迁密切相关。这一时期史著受内地文化、史学的影响显著增强，对清朝的正统性明确予以肯定，反映出蒙古人的国家认同持续增强及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深入发展。⑦罗宏、孙昭亮指出藏文文献对清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治理下汉、藏、满、蒙关系的阐述有特殊理解，在清代政教相关的叙事中，藏文文献往往将“汉藏蒙”并置为一个整体，“满”被融入汉的相关叙述中，从而达成“汉藏满蒙”共同体的共识。⑧曹大明、李扬通过对清代浙南畲族族谱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东南山区的畲民在多民族长期的交往融合中逐渐习得编修族谱，并将其视为表达权利和身份的重要载体。族谱的创修过程体现了大一统国家内少数民族与王朝国家的互动。⑨

本年度研究以多学科视角为支撑，不仅深化了对清代多民族国家构建逻辑的认知，更凸显了“大一统”观在疆域奠定、民族交融和中央集权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根基提供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二、“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2024 年，葛兆光教授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在学界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该书力求

① 高人雄：《一份幸存的清末新疆义学经费请销呈报管窥》，《西域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② 杨一章、张莉：《义仓首事与近代吐鲁番地方社会》，《清史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③ 阿利亚·艾尼瓦尔：《中国传统救灾体系的跨地域实践——以清代新疆镇迪道防灾救灾建设为中心》，《清史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④ 武强：《清代新疆博格达山地理意象的演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 年第 4 期。
⑤ 邹立波：《清代前期经略西藏与川藏道上的将军信仰》，《民族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⑥ 崔思朋：《19 世纪中叶以来呼伦贝尔地区甘珠尔庙会的商业活动及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⑦ 张光耀：《18—19 世纪漠南和漠北蒙古草原史著的历史书写——以正统史观及其变迁为中心》，《清史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⑧ 罗宏、孙昭亮：《清代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与启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⑨ 曹大明、李扬：《清代和民国时期浙南畲族族谱创修与家国认同》，《民族研究》2024 年第 1 期。

"去中心化","从中国视角出发"而非"以中国为中心"来建构全球历史与文化之间的联系。[①] 清代是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发生交集最为集中的朝代，2024 年的清史研究除一如既往关注清朝与西方列强的碰撞之外，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更为多元与客观，在加深清朝"睁眼看世界"研究的同时，关注世界观察和了解清朝的过程。

（一）清朝看世界

清代前期，皇帝就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对西方世界产生兴趣，本年最受关注的历史著作之一《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即探讨了这样的主题。作者以 1716 年康熙帝发往欧洲的一道谕令（红票）为线索，指出西方传教士不仅教授康熙帝西学，还帮他建立起与欧洲的各种联系，红票正是清廷早期观察世界并开展中西交流的绝佳印证。[②] 康熙以后，清朝与西方的交流既有延续也有中断。吴根友的研究揭示了 16—18 世纪面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明清士大夫分为拒斥与接纳两派，体现出明清之际中西文明的冲突与交流。尽管雍正帝的禁教措施标志着拒斥派取得暂时胜利，但对于西方世界认知和交流的必要性已然为清帝所认可。[③] 聂大昕考证了乾隆朝的"西洋馆"，指出设立此类机构的目的，在于培养外语与翻译人才，便于与欧洲的交流。[④]

近代以来，受国际局势与国族危机的影响，更多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洋之人对亲身经历的描述，西方科学著作、思想理论的翻译和引介都增加了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

晚清出洋之人记录的经历和见闻，以国人视角向同胞介绍西方的地理文化、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对清人认知世界有重要影响。皇甫峥峥分析了 6 位出使欧美官员的游记、公文等文献，呈现晚清使臣如何看待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将这些信息传回国内，揭示官方信息采集与传播模式的演变。[⑤] 沙红兵聚焦晚清出洋诗人在体验到中西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处于加速发展中的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后所创作的诗歌，指出诗中提到的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电报、电话等信息技术，成为国人认知西方世界的一种途径。[⑥] 邵建以晚清外交官等出洋群体对西方女性的描述为中心，探讨了清人对西方女性外在形象、家庭和社会地位、经济和人格独立等方面的认知，指出尽管此类观察具有局限性，仍体现出国人试图了解世界的过程。[⑦]

书籍和报刊的翻译也是清人了解西方的重要途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书籍。宋晓煜考察了进化论在清末的翻译与传播过程，将其传播的西方路径和日本路径进行对比，呈现近代学习西方思想的不同渠道。[⑧] 何洪涛通过梳理不同群体对《国富论》的译介、理解、接受、运用和批判，揭示该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轨迹和特点，及其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⑨] 蒋建国、汪宁宁关注到甲午战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翻译的《治心免病法》在士人之间传播与阅读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的"治心"与"救世"理念相结合，引发了士人对"国家身体"的想象和感知，体现出清末士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利用，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⑩] 刘菲雯聚焦清末西药书籍的翻译，指出西方传教士和国人对西药书籍的翻译和引介工作，大大增

---

① 葛兆光主编：《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 年。

② 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 年。

③ 吴根友：《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

④ 聂大昕：《"华夷译语"卷端题名中的"西洋馆"》，《中华文史论丛》2024 年第 1 期。

⑤ 皇甫峥峥：《远西旅人：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汪林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

⑥ 沙红兵：《晚清海外诗的"加速世界"》，《文史哲》2024 年第 6 期。

⑦ 邵建：《晚清出洋中国人对西方女性的认知——以同光新政出洋人士日记为中心》，《学术月刊》2024 年第 4 期。

⑧ 宋晓煜：《清末进化论翻译的政治思想：西方与日本路径的比较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 年。

⑨ 何洪涛：《〈国富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 年。

⑩ 蒋建国、汪宁宁：《清季士人的察弊、治心与济世——以〈治心免病法〉传阅为中心》，《学术月刊》2024 年第 8 期。

加了西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和力度，影响了普通国人的医药观念。① 卞冬磊考察了报刊在晚清国人睁眼看世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清朝官员群体通过阅读报刊建构起对西方世界的认知，之后报刊读者逐步扩大，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②

西方思潮的涌入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革命理论。顾少华通过考察法国大革命的相关信息在晚清的传播，以及各界人士对法国革命的解读，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③ 余露聚焦清季十年风行中国的"世界大势"论，指出甲午战败后"世界大势"概念由日本传入中国，在梁启超的倡导和国内士人及留学生的群起响应下，对当时社会形成深入而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的重要驱动力。④

国际法的引入则直接将清朝纳入世界政治体系，也对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产生重要影响。邱唐指出早在清末大变局之前，清朝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对外法律秩序体系，并在亚洲甚至欧洲等地理范围内长期有效运作。"多元性"是清朝对外法律秩序的重要特点。⑤ 万立从清季对国际法的翻译入手，揭示清廷希望通国际法秩序维护中国主权，但从伯驾翻译滑达尔"万国法"到丁韪良翻译惠顿"国际法"的历史主义转变，让清廷最终意识到国际法无法保护中国的合法利益。⑥ 何俊毅同样以晚清国际法的传入为主线，对晚清主权意识的生成进行考察，呈现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从"中国之天下"向"世界之中国"转变。⑦

睁眼看世界的过程，让清人逐渐形成对"国家"与"主权"概念的认知。郭卫东与江伟涛关注到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冲击下，海洋观念和权利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江伟涛梳理了"海权"一词在近代引入中国并赋予新内涵的过程。⑧ 郭卫东则指出明清以来中国人通过"观世界"，在地理和心理层面对各"洋"进行了整合和接受，并形成了新的世界观。⑨

（二）世界看清朝

在清朝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相较于前者，世界对于清朝的观察以往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2024 年这方面的研究得以充分展开，让读者更加深入地感受到来自"他者"的审视，以及清朝在东西方世界中的客观定位。

处于汉文化辐射圈且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往来的日本和朝鲜，一向关注清朝的动态。葛继勇、许浩对江户幕府编写的《清朝探事》一书进行译注与研究，指出该书是 18 世纪前期日人了解清朝的重要资料，为江户幕府推行享保改革提供了借鉴，展现了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力。⑩ 聂友军梳理了日本使者柳原前光《使清日记》的内容，分析其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以及日记中呈现的晚清社会、近代中日关系、两国殊途分野的近代化进程。⑪ 王元周以明清时期的燕行录为主要史料，论述了朝鲜使团往来中国途中的见闻，呈现使团对中国的观察与感受，以及宗藩体制下中朝关系的复杂形态。⑫ 雷雨晴则关注朝鲜对台湾郑氏政权的态度，通过朝鲜围绕如

---

① 刘菲雯：《走向公众：清末民初的国人译编书籍与西药知识的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

② 卞冬磊：《可见的中国：新闻与现代世界的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

③ 顾少华：《晚清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叙事及其思想意涵》，《学术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④ 余露：《清季十年的"世界大势"论与辛亥鼎革的驱动力》，《学术月刊》2024 年第 2 期。

⑤ 邱唐：《清代对外法律秩序体系之规范研究》，《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1 期。

⑥ 万立：《从万国法到国际法——清季国际法翻译与国际法历史主义转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1 期。

⑦ 何俊毅：《从天下到世界：国际法与晚清中国的主权意识》，商务印书馆，2024 年。

⑧ 江伟涛：《近代中国"海权"话语构建的源起》，《清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⑨ 郭卫东：《新世界观的形成：东、西、南、北洋的概念流变》，《清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⑩ 葛继勇、许浩：《〈清朝探事〉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 年。

⑪ 聂友军：《柳原前光〈使清日记〉研究与校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 年。

⑫ 王元周：《皇帝的客人：使行往来中的情感与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何对待郑氏展开的激烈争论，生动呈现朝鲜王朝对于郑氏政权的认知与想像，以及对中朝关系的态度。①

欧洲对于清朝的早期认知多来自来华使团、传教士、商人所带回的信息和见闻。欧阳泰（Tonio Andrade）重新评估了荷兰使团来华的历史意义，呈现使团对清朝的皇帝、权臣以及中国普通百姓的记述，指出欧洲与中国的相遇并非都不欢而散，而荷兰对于清朝有着较为深入的认知。② 陈珊珊以马戛尔尼使团中的艺术家在华创作的图像为研究对象，揭示视觉媒介如何参与构建 18 世纪西欧社会的中国认知体系并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认识。③ 孔迎川梳理了元明清以来欧洲使者绘制的中国舆图的变化过程，指出这些舆图虽然增加了欧洲对中国地理信息的了解，但体现的是欧洲所掌控的疆域诠释话语，存在对中国疆域形象的歪曲。④ 汤开建、田一言介绍了 18 世纪末来到广州的西班牙人阿戈特的日记手稿，其中详细记录了十三行商业信息和当时中国发生重大事件，还有阿戈特绘制的澳门城市平面图、人物形象图等，是当时西人了解中国的珍贵史料。⑤ 陈艳、元青聚焦晚清来华西人对塾师的书写，指出虽然其书写存在歪曲和想象，仍在一定程度上为观察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多维视角。⑥ 程露关注汉口开埠后英籍西医对当地疾病状况的调查，指出西医一方面从殖民医学视角调查了疾病与汉口卫生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从区域比较视野将汉口与中国其他地区、欧洲进行对比，展现了晚清汉口的民众生活状态、疾病观念与地方社会风貌。⑦

报刊等媒体也是清朝信息得以在欧洲传播的重要媒介。赵莹指出 19 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西人十分重视《京报》所刊载的消息，并展开以传教士和外交官为主力的《京报》翻译工作，展现出欧洲对于中国信息的关注以及中国信息向外传播的途径与影响。⑧ 崔华杰以《教务杂志》这部西人在华创办的英文刊物为研究对象，指出该杂志发表了相当数量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文章，致力于帮助西人了解中国。⑨ 刘文明通过甲午战争期间英美报刊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和评论，指出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空间开始形成，将中日甲午战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公共舆论空间，为理解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维度。⑩ 张晓宇聚焦《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关于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全遭屠杀谣言的报道，指出虽然中国官员频频辟谣，欧美世界对谣言仍深信不疑，体现出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固有的偏见。⑪ 马玺考察了“马嘉理事件”在英国引发的反响，指出英国报刊将马嘉理之死定义为“谋杀”，是中国野蛮性和中英文明冲突带来的悲剧性结果。报道引发了英国公众的广泛关注，而马嘉理的遭遇和经过媒体改造的报道内容也成为英国民众关于中国认知的一部分。⑫ 季念分析了《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皇帝、官员、军人及百姓的形象，揭示西方媒体如何运用新闻话语与知识权力共同塑造中国人的形象。⑬

整体来看，本年的清史研究强调将清朝置于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之中，通过挖掘东亚的情报

① 雷雨晴：《异域之眼：朝鲜王朝对台湾郑氏政权的认知与想象》，秀威出版，2024 年。
② 欧阳泰：《最后的使团——1795 年荷兰使团和一段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黄中宪译，时报出版，2024 年。
③ 陈珊珊：《凝视远邦：1793 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视觉文化》，商务印书馆，2024 年。
④ 孔迎川：《西方舆图所见元明清时期中国疆域形象辨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⑤ 汤开建、田一言：《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广州商馆日记〉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贸易和广州十三行史料》，《清史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⑥ 陈艳、元青：《晚清来华西人对塾师的多维书写与形象建构研究》，《安徽史学》2024 年第 4 期。
⑦ 程露：《晚清来华西医对汉口的疾病调查（1864–1874）——以医院年报、海关医报为中心》，《历史档案》2024 年第 1 期。
⑧ 赵莹：《信息之争：〈京报〉的英译、传播与影响（1802—19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⑨ 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教务杂志〉与中国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 年。
⑩ 刘文明：《全球性公共空间中的甲午战争：以英美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24 年。
⑪ 张晓宇：《义和团运动时期英文报纸中的“大屠杀”谣言》，《历史研究》2024 年第 9 期。
⑫ 马玺：《马嘉理之死：“滇案”后的信息传播与英帝国的公众情感》，《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 年第 5 期。
⑬ 季念：《〈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研究（1842—187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年。

文献、欧洲使团记录、西人报刊与著述等多语种史料，呈现不同文明视角下清朝的形象与定位，力图构建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清代中外关系史图景。

三、以图证史：更加丰富多元的图像史研究

2024 年的清史研究无疑更加注重图像对历史的印证作用，不仅一些著述配有丰富的插图，更有专门的图像史研究，涵盖地图、人物肖像、宫廷画、版画等领域，将“以图证史”推向新的高度。

（一）舆图研究

2024 年舆图研究仍在清代图像史研究中占比最大，大至国家疆域图，小至山场经管地图，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进一步充实了我们对清人疆域观念、绘图技术和理念、区域空间布局的认知。

宏观性舆图的研究。任桂磊论述了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设计的一套地图测绘方法，指出该法在继承中国传统测绘技术的同时，进行了改良与创新，显示出时人对先进测绘技术的探索与关注，为观察中国近代地图绘制的转型提供了一个视角。① 韩昭庆对康熙《皇舆全览图》与齐召南所著《水道提纲》进行图文互勘，指出前者是后者写作的主要参考资料，后者成为前者河湖水系的“图说”，二者互证，相得益彰。② 华林甫、赵逸才厘清了清代对松花江、黑龙江、混同江的认知脉络，指出因清朝有意提高长白山和松花江的地位，时人多认为长白山为松花江正源，把黑龙江当作松花江的支流，导致松花江干支流名称一直处于混乱状态。③

海图方面的研究多侧重制图技术和理念。郭亮探讨了欧洲列强对中国沿海、台湾、琉球群岛及南海区域的测绘活动及其背后的权力博弈，并从图像的维度考察近代中西科技差距与海洋战略差异。④ 何国璠、韩昭庆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海图方位的演变，指出沿海全图从明代“海上陆下”式到清代“海下陆上”式的转变，清后期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海防形势，由区域图组成的图集取代长卷，海图方位多呈现“上北下南”，并随着近代海图绘制的标准化固定下来。⑤ 何国璠还考证了道光朝海运图的版本源流，指出清朝实施漕粮海运的过程产生一批海运图，道光朝海运图的成图，是康熙朝开海禁后北洋海域形成繁荣的沙船航运业的客观因素，与陶澍等人倡导经世致用，注重从实践中访求海疆舆地知识的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⑥

区域地图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挖掘前人关注不够的珍稀地图。张亮聚焦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渝城图》，指出此图系艾仕元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增补摹绘而成，并赋予该图军事性、商业性特征，呈现了绘制者对方志中“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认同。⑦ 哈斯巴根对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察哈尔八旗地图》进行介绍与考证，推测该图集的绘制时间为光绪二年十月至四年四月间，较为详细地反映了晚清察哈尔都统辖区的政治地理状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⑧ 卜凡对考察了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直隶省津保一带淀河图》，指出该图应绘制于乾隆十一年至十六年间，是乾隆前期畿辅水利工程建设成果的直观记录，纠正了之前学界认为该图绘于光绪年间的

---

① 任桂磊：《从冯桂芬测绘方法看中国近代地图绘制的转型问题》，《历史地理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② 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水道提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 年第 3 辑。
③ 华林甫、赵逸才：《文献、舆图与传统认知：清代关于混同江水系的认知体系》，《社会科学》2024 年第 4 期。
④ 郭亮：《权力的图像：近代的中国海图与交流》，商务印书馆，2024 年。
⑤ 何国璠、韩昭庆：《明清时期中国海图方位的演变》，《历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⑥ 何国璠：《道光朝海运图版本源流考》，《文献》2024 年第 2 期。
⑦ 张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晚清〈渝城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 年第 2 辑。
⑧ 哈斯巴根：《国家图书馆藏〈察哈尔八旗地图〉初步考释》，《清史研究》2024 年第 2 期。

说法。[①] 李花子指出内藤湖南发现的“满文长白山图”，应称之为满文“宁古塔朝鲜边境图”，该图沿各河流干流所标点线，是为制作《皇舆全览图》进行考察、测绘的路线，该图的制作年代为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六年，是中方人员和西方传教士合力的成果。[②] 马国君、杨庭硕聚焦清水江文书中的山场经管地图，将此类地图分为三类进行具体介绍，指出其为研究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调节人工营林产权纠纷、促进林业可持续运行的重要物证。[③]

（二）绘画与视觉文化研究

本年度的清代绘画研究，除以往较受关注的宫廷画外，各类官方与民间的绘画，以及西人所绘的清代图像也成为关注对象。

宫廷与皇权一直是清代图像史研究关注的主题，其范围不限于宫廷画，清代一些其他类型绘画也与宫廷和皇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衣长春、孙宇分析了雍正宫廷行乐图中“杖挑蒲团图”的内容与意涵、创作背景与目的，指出胤禛即位前后图像意象功能的转变，以及行乐图所彰显的个人情趣与人文情怀。[④] 许彤考察了乾隆时期北京西山的实景山水画，探讨乾隆时西山形象与以往的不同，以及朝廷对西山形象的塑造过程，揭示图像背后所蕴含的乾隆帝的意识与观念。[⑤] 邢陆楠聚焦邹一桂所绘《杏花图》及乾隆帝在画上所题的 14 则诗，解读乾隆帝的个人喜好及君臣间的书画往来，同时指出这一艺术活动与盘山行宫景观关联密切，可由此考察乾隆帝对于特定意义空间的营造。[⑥] 董丽慧以慈禧肖像为核心阐释了清代宫廷肖像的制作及国内外政治生态的变化，以及摄影术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渐渐“东方化”的现象。[⑦] 高登科聚焦清代苏州版画的历史脉络，分析画中四时节令与皇权象征的关联，探讨西洋风格影响下形成的“四时同屏”等时空并置图式，版画中自然时序与权力秩序的交织逻辑，以及清宫铜版画与苏州民间创作的互动关系，阐释图像在清代文化传播与权力建构中的媒介功能。[⑧]

“大一统”观也是清代绘画中一个重要的主题。郭丹丹、黄金东指出《皇清职贡图》中绘制了精美写实、数量丰富的女性绘像，呈现出与以往职贡图及“苗蛮图”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与清前中期统治者摒弃“华夷观”，重塑以“疆域一统”为首义的“正统论”息息相关，也反映出统治者试图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核心构建涵盖多性别、多族群“大一统”文化认知体系的进程。[⑨] 黄厚明关注明清绘画中的盆栽图像，指出在清朝盆栽美学在断裂与连续的双重构造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态，也成为满人汉化的重要特征。宫廷画中，不同品种、时节和地域的花卉被栽在同一盆中，体现出独特的政治意涵。[⑩] 冯文开、奥日莎关注始于明末清初的“指画”流派，论述其在清代八旗画家中流行，并在宗室助推下升格为多民族共享共创的艺术流派的过程。[⑪] 罗宝川通过对清代百苗图与竹枝词的考察，指出地方官员通过绘制百苗图构拟“视听形象”行为的背后，潜藏着建构大一统“视听秩序”的制图动机与资政逻辑。[⑫] 廖旸以“六根清净图”为线索，指出从明到清各类人士对清净的理解不断重构，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真实展现。[⑬] 苍铭、袁

① 卜凡：《国图藏清彩绘本〈直隶省津保一带淀河图〉绘制时间考》，《文献》2024 年第 2 期。
② 李花子：《盛京翔凤阁藏满文“宁古塔朝鲜边境图”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 年第 2 辑。
③ 马国君、杨庭硕：《清水江文书所见山场经管地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 年第 4 辑。
④ 衣长春、孙宇：《“闲人”到“圣王”：胤禛的形象塑造——以〈杖挑蒲团〉为中心的考察》，《形象史学》2024 年第 2 期。
⑤ 许彤：《西山正脉：乾隆皇帝与西山图像关系研究》，湖南美术出版社，2024 年。
⑥ 邢陆楠：《邹一桂〈杏花图〉与盘山行宫东竺庵》，《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 年第 11 期。
⑦ 董丽慧：《“御容”与真相：近代中国视觉文化转型（1840–192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 年。
⑧ 高登科：《天运四时：清代苏州版画中的文化图式与皇权象征》，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 年。
⑨ 郭丹丹、黄金东：《清代大一统话语体系图像呈现——基于〈皇清职贡图〉女性绘像的考察》，《中国民族美术》2024 年第 4 期。
⑩ 黄厚明：《视觉逻辑与审美发生：明清绘画中的盆栽图像》，《形象史学》2024 年春之卷（总第 29 辑）。
⑪ 冯文开、奥日莎：《清代指画中多民族交融现象论析》，《黑龙江民族丛刊》2024 年第 6 期。
⑫ 罗宝川：《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听形象”——基于清代百苗图“语 – 图”书写的建构》，《民族艺术》2024 年第 4 期。
⑬ 廖旸：《重构语境——明清时期的“六根清净图”》，《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 年 10 月。

旖婳通过全面梳理现存各版本清代“番社风俗图”，指出至乾隆时期台湾与大陆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台湾地区的服饰与审美倾向逐渐汉化，充分说明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作为密不可分的整体的客观存在。[①] 郭小影通过海内外收藏的与土尔扈特东归事件相关的历史图像，考察了土尔扈特东归对促进清代“大一统”起到的作用，凸显了图像史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各民族交流交融研究中的价值。[②] 孙景超聚焦明清时期随着边疆开发与治理的深入而大量涌现的“滇夷图”，指出其中保留了明清时期不同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分布状况，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背景下的民族交流、交融与整合。[③]

整体而言，本年度的图像史研究突破传统图像解读的单一维度，将图像与文献互证、观念与实践结合，不仅拓展了清史研究的史料边界，更以视觉媒介为切入点，深化了对清代疆域建构、权力表达、民族交融及中外认知的理解，为清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形形色色的人物研究

清代各类人物的研究是 2024 年清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人物既有朝廷重臣、知名文士，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有单个的人物研究，也有不同人物群体的研究，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由偏重政治制度和重要事件向更加关注人的方向发展。

（一）人物个体研究

本年度的人物个体研究仍偏重高官大吏和知名文人，但研究更加深入，视角更加多元，完善了学界对于某一特定清代人物的认知。

清代官员的研究，多系对前人尚未关注的该人物的某一侧面进行深入考察，但在人物的时期分布上呈不均衡态势，清前中期的官员只有寥寥数文。冯双元通过新发现的墓志史料，对清初官至户部、吏部尚书的马希纳生平事迹进行考证，论述其与逃人法、三藩之乱等重要事件之间的关系及其家族情况，对学界了解马希纳及哈达纳喇氏家族皆有助益。[④] 郑小悠由《宦海闻见录》入手，考证其作者为嘉道时期在浙江、山东担任知县、同知等职的张祖基，同时考察了张祖基的官场沉浮和著作颇丰却多佚失的人生际遇。[⑤]

相对于清代前中期，晚清官员的研究则丰富得多。刘青峰全面考察了张之洞督粤政事，呈现督抚制在辛酉至甲午政局中的运作机制，指出在“内轻外重”的格局下，两广总督并非拥有无限权力，而受中央、地方官绅、省级大员、列强的限制，这些限制因素在清季逐渐演变为具象化的分割，终成“内外皆轻”之局。[⑥] 戴海斌聚焦中法勘界辩论中两广总督张之洞通过历史文献的考据，对 19 世纪末的国际关系格局提出挑战一事，分析张之洞考据的本土史学资源，以及“学术外交”的意义与局限。[⑦] 张建斌以清浊之争为线索，考察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整合清流士人与北洋朋党抗争的过程，指出清流口诛笔伐的结党成为瞿出枢的关键要素。清流浊化影响了清末政治生态，折射出鼎革前后士人面对变局的抉择与命运轨迹。[⑧] 邹晗则从张佩纶的仕途进退考察清流士人的命运，指出甲申易枢后张佩纶的作为皆与当国之醇王有直接关系，但随着醇王

---

① 苍铭、袁旖婳:《台湾“番社风俗图”：清代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图像见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② 郭小影:《土尔扈特东归的历史图像研究》,《民族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③ 孙景超:《明清云南〈滇夷图〉的流传与边疆民族的形象构建》,《形象史学》2024 年秋之卷（总第 31 辑）。

④ 冯双元:《新获清吏部尚书马希纳墓志考》,《历史档案》2024 年第 2 期。

⑤ 郑小悠:《张祖基及其〈宦海闻见录〉初研》,《文献》2024 年第 4 期。

⑥ 刘青峰:《晚清督抚权力结构与地方治理：张之洞督粤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⑦ 戴海斌:《“以考据施于交涉”：张之洞在中法勘界辩论中的“学术外交”》,《文史》2024 年第 4 辑。

⑧ 张建斌:《清流与朋党：瞿鸿禨与清末政局》,《近代史研究》2024 年第 6 期。

对清流态度的改变，张佩纶终被流放，而清流的被惩治也深刻影响了日后晚清政治的走向。① 邓政阳系统梳理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涉及的 2400 余位交游人物，构建了李慈铭社交网络的完整谱系，提供了研究晚清官员、学者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范例。② 郑泽民从王文韶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作为与沉浮入手，考察了王的政治理念及其在晚清朝局中的地位，揭示这一时期清廷的势力派系、矛盾斗争，以及所面临的内外危机。③ 常嵩涛聚焦 1899 年震动朝野的沈鹏上书事件，指出沈氏上书更多是由于精神疾患加重而产生的极端行为，但事件发生后各大势力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将其包装为反抗暴政的“神话”。④

相较于官员的研究，清代文人的研究在年代分布上较为均衡。当然，官员与文人并非两个毫不相关的群体，不少文人都曾经为官，本文的分类依据是，若考察的是该人文化思想方面的贡献而非政绩或官场经历，即将其归入文人研究类别中。

清代前中期的文人研究多集中于其学术思想或书籍考订方面。黄爱平探讨了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祖禹学术思想中蕴含的经世之志和兴亡之感，以及传承意识和史地观念，指出这既反映了时代思潮共同的主题，也彰显出自身鲜明的特色。⑤ 孙靖、王媛考察了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的方志校勘工作，指出刘氏的校勘态度通达、实事求是，还归纳总结了校勘理论，为清代的地理方志校勘工作做出了贡献。⑥ 徐道彬在深入考察徽州“三洪”即洪榜、洪朴、洪梧兄弟生平与学行的基础上，展示其弘扬“戴学”与推动乾嘉汉学发展的历史功绩，指出洪氏兄弟是“皖派”学术的护法和代表人物。⑦ 赵成杰从《金石萃编》所录的 374 则题跋考察乾嘉金石学家王昶的金石学思想，指出其题跋具有明显的“以论附注”特点，即在行文中考订金石原委、归纳金石义例、总结学术流变。⑧ 钱茂伟对章学诚史学的现代性层面进行考证，指出章氏史学已透露出现代史学的曙光，突破了考证史学的樊篱，进入本体历史的研究阶段。从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二分视野来看，他的史学研究由文本世界回归社会生活，即事求道，符合现代史学路径。⑨ 谢辉考察了清代著名文人钱熙泰与友人于道光年间三赴杭州文澜阁访书的经历，指出其访书行动，不仅将文澜阁存书流传后世，也对他个人的版本校勘观念产生影响。⑩

清代后期的文人研究，多考察其个人命运与时代变革之间的关系。彭春凌深入探讨了章太炎的思想流变，揭示清末知识界对西学的吸纳与重构，展现章太炎如何融合西学重塑传统儒术，以此来把握中国近代思想的全球史脉动。⑪ 关爱和考察了刘师培入端方幕府的细节，指出他受章太炎之邀赴日参与《民报》编辑，后与章太炎失和，最终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而公开入其幕府。刘师培的选择与命运，终成大时代中令人扼腕之事。⑫ 张济顺聚焦清末民初《迈尔通史》《世界名人传略》的译者及商务版《汉英辞典》的编纂者张在新，将其编译生涯置于家庭、教育背景以及清末民初的历史巨变中进行考察，揭示上海本土知识人在西学传播热潮中的角色与贡献。⑬

---

① 邹晗：《甲申朝局与张佩纶之进退》，《史学月刊》2024 年第 9 期。
② 邓政阳：《李慈铭交游人物生卒年表》，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 年。
③ 郑泽民：《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5 期。
④ 常嵩涛：《历史记忆与“神话”制造：1899 年沈鹏上书事件再研究》，《安徽史学》2024 年第 3 期。
⑤ 黄爱平：《顾祖禹学术思想与史学特色析论》，《史学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⑥ 孙靖、王媛：《清刘文淇、刘毓崧地理方志校勘述评——以〈宋元镇江志校勘记〉〈舆地纪胜校勘记〉为例》，《历史地理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⑦ 徐道彬：《论徽州“三洪”对乾嘉汉学的守成与开拓》，《安徽史学》2024 年第 3 期。
⑧ 赵成杰：《以论附注：王昶金石题跋与清人的金石阅读》，《北京社会科学》2024 年第 8 期。
⑨ 钱茂伟：《章学诚史学的现代性》，《史学理论研究》2024 年第 6 期。
⑩ 谢辉：《钱熙泰、张文虎文澜阁访书考略——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中心》，《文献》2024 年第 5 期。
⑪ 彭春凌：《原道：章太炎与两洋三语的思想世界（1851—19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⑫ 关爱和：《清末刘师培入端方幕府风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⑬ 张济顺：《张在新与清末民初的译书及辞书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4 期。

一些著名文人引起学界较多的关注。至少三篇论文聚焦清末思想家王韬，鲍文欣考察了王韬历史思辨思想的中西方源流，指出其在19世纪后期中国历史思辨的变迁中具有代表性。① 陈玉兰、张文娴则考证了王韬将所携一万一千卷图书置于英国博物院一事，指出“置书”数量并非夸大其词，当时英国至少有30家报纸对此事予以报道，是颇为重要的文化事件。虽然所谓“置书”是售卖而非捐赠，也无损其在中英文化交流以及中学西传中的意义。② 胡天舒对甲午战争时期王韬的日本观进行探讨，指出其既有时代性的变化，又有主体性的固守，既有对日本施行近代化维新政策的赞赏，也对日本盲目学习西方的举动表示不可取，显示出王韬对民族、国家和国际危局抱有强烈的关心。③

多部著作和论文对康有为的学术与变法思想进行探讨，其中康氏的“三世说”是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三集》中先考察了康有为与光绪帝的关系，揭示康在戊戌变法中的主导作用，再从经学史的视角剖析“大同三世说”的发展脉络和学理依据，最后从“弭兵会”入手考察康有为走到政治舞台中央的晋身之路。④ 宫志翀以经学传统为脉络，剖析康有为“三世说”的建构过程与内核，指出面对现实困境，康有为调整“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倾向，将其转化为应对近代文明危机的政治哲学工具。⑤ 陆任驰同样以“三世进化论”为线索，对康有为思想中的“三世进化”及其“虚君共和”的变法策略等议题进行梳理、诠释。⑥ 杨念群则指出康有为的思想结构大多是传统儒学思维脉动的延续，具有“地域之学”“经世之学”“大同之学”三个不同面相，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贯通解释系统。西学只是起到点缀和激活这些传统思想的参照作用，并非康有为构思晚清政治变革主张的关键因素。⑦ 尚小明深入考察了康有为与翁同龢、张荫桓的关系，指出不论翁同龢荐康说，还是张荫桓荐康说，都失之偏颇，二人在光绪帝起用康有为一事上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翁同龢后与康疏远，“百日维新”开始后张荫桓成为康的主要支持者。⑧ 陶亮则聚焦廖平、康有为之“学术公案”，指出此案难以定论的关键在于忽视了作为整体运思的“两篇”与“两考”，其著述形式与思维逻辑是廖、康唯一完全相同之处，二人今古学体系全然不同，由此亦反映出清末思想界的内在分裂。⑨ 於梅舫考证了康有为与朱子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康有为对于朱子学说的运化贯穿于成学立教的全过程，其思想对戊戌前士林与官场人士的认识与接受产生了极大影响。⑩

除官员和文人外，也零星存在其他类型人物的研究，其中两部还以独特的研究对象在学界引发较大反响。沈爱娣聚焦马戛尔尼使团中的两位翻译李自标和小斯当东，将他们的人生沉浮与使团出使交织在一起，揭示翻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其中的误解与文化冲突。⑪ 刘永华以普通徽州乡民程允亨的生命历程为主线，再现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中的饮食衣着、读写实践、仪式活动等不同面向，重估那个时代乡民生活的实际境况及变动，是2024年中国史领域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作。⑫

---

① 鲍文欣:《19世纪后期中国历史思辨的变迁：以王韬为中心》,《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② 陈玉兰、张文娴:《王韬“置书英京博物院”事件考论》,《文献》2024年第5期。

③ 胡天舒:《甲午战争前后王韬对日认识的变与不变》,《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④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

⑤ 宫志翀:《人为天生：康有为三世说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

⑥ 陆任驰:《康有为“变法”理论探析》，当代中国出版社，2024年。

⑦ 杨念群:《贯通“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近代儒学体系——康有为“新粤学”发微》,《清史研究》2024年第2期。

⑧ 尚小明:《翁同龢、张荫桓与戊戌康有为之进用》,《清史研究》2024年第2期。

⑨ 陶亮:《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之再鞫与定谳》,《清史研究》2024年第6期。

⑩ 於梅舫:《朱子学与康有为早年成学立教的理路》,《清史研究》2024年第5期。

⑪ 沈艾娣:《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赵妍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

⑫ 刘永华:《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

（二）人物群体研究

2024 年关于清代人物群体的研究呈丰富多彩的状态，不同阶层、族群、地域的人群均有涉及，大大丰富了学界对于清代不同群体及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认知。值得指出的是，相较于个体研究，群体研究更加关注基层官员和百姓，切实体现出“眼光向下”的学术趋向。

力图呈现清代形形色色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本年度人物群体研究的重要特点。常建华利用清代刑科题本档案研究普通“打工人”的历史，还原底层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分析血缘、地缘、业缘对劳动者生存策略的影响；常氏对僧人群体的研究则指出，僧人出家改变了生命历程，与俗家亲族、僧侣之间、僧俗之间，建构了三个圈层关系，而下层僧人在为生计忙碌的层面上与俗人无异。[①] 马俊亚聚焦明清时期的“好老”（漕粮运丁中的能人）群体，考察这一群体的生存对策，指出尽管“好老”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却永远处于社会下层，消灭“好老”的正途是法治和市场，解决运丁生计贫困的良方是消除对自由劳动的束缚。[②] 董乾坤、王大宁关注明清时期徽州大量存在的堪舆师群体，探讨其来源、技术获得途径以及家族特色，指出作为民间知识群体，堪舆师通过风水知识的社会性应用结交官府、士人，构造风水景观，扩展自身乃至家族的文化竞争力，助推风水观念在徽州社会的兴盛。[③] 梁勇、王位聚焦明至清初川东南的移民群体，指出随着王朝国家向西南“边缘”地区纵深拓展，大量移民流入川东南地区，而移民身份逐步成为不同人群为维系利益而形塑身份的工具和符号。这一过程亦是王朝国家统治力量和秩序拓展的过程，与王朝国家对传统“边缘”地区的治理，以及族群间的关系网络形成和互动融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④] 刘小萌关注了清前期东北移民中的“出民入旗”群体，指出清前期东北民人入旗是八旗制度在清朝统治中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需要的典型体现，对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⑤] 华立、吴轶群考察了乾隆朝活跃于新疆与内地之间进行玉石交易的商人群体，勾勒万里玉路和流通网络，探讨新疆玉石交易的意义，并对“汉回隔离”提出商榷。[⑥] 何爱民聚焦广州贸易中的行外商人，指出清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中，行外商人是为数众多且高度活跃的群体，不仅经营小手工业品，还在行商担保下合法参与瓷器、茶叶等大宗货物的对外贸易，是广州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⑦]

对于官员群体的研究，以基层官员和小吏为主，与个体研究偏重高官大吏刚好形成互补。王卫用数据统计的方式，分析了有清一代 816 名部院大臣的群体结构和仕途流动特征，指出其中的旗人数量远多于汉人，又以“上三旗”占大部分，各部门间部院大臣的流动速度差异较大，朝廷对部院大臣的惩处率较高，揭示了清代中央官僚体制的运行状况，也是唯一一篇对高官群体进行研究的论文。[⑧] 胡存璐同样运用数据统计与分析的方式，对 4477 名山西知县进行考察，揭示清代山西知县在省内的流动方式、流动规律和特点，为观察清代官员选任制度的规定与运行，以及理解清廷调配官僚资源提供了新视角。[⑨] 陈俊、康文林依托 73 个版本的《中枢备览》，对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群体进行分析，指出绿营中层旗人武官比例呈现官职越高下降幅度越大的特点，表明清后期的军事集权政策走向失败，而武官的出身构成也反映出清后期武选制度走向

---

① 常建华：《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 年；《亦僧亦俗：清中叶僧人的人际纠纷及其生活——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史学集刊》2024 年第 4 期。

② 马俊亚：《“好老”：明清漕运体制与运丁生存之道》，《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

③ 董乾坤、王大宁：《正统之外：明清时期徽州堪舆师群体初探》，《安徽史学》2024 年第 4 期。

④ 梁勇、王位：《明至清初川东南地区移民的身份形塑》，《民族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⑤ 刘小萌：《清前期东北民人的“出民入旗”》，《民族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⑥ 华立、吴轶群：《试论乾隆时期新疆玉石的内地流通与商人群像》，《清史研究》2024 年第 6 期。

⑦ 何爱民：《清雍乾时期广州贸易中的行外商人——以瑞典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⑧ 王卫：《清代中央部院大臣的群体结构及仕途流动》，《历史档案》2024 年第 1 期。

⑨ 胡存璐：《清代山西知县空间流动的量化分析》，《近代史研究》2024 年第 5 期。

僵化。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清廷军事政策的调整是中下层武官群体结构转变的主要原因。[①] 周云逸、王彤语聚焦清代外派地方的太医群体，考察太医院医官奉旨外派地方为官员治病的过程，指出御医是外派太医的主力成员，成为皇帝维护君臣关系、控制臣下的一种方式。[②]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官僚体系边缘地带的清代边疆基层官吏，也受到一定的关注。李阳聚焦清代边疆卡伦侍卫群体，考证清代派驻卡伦侍卫的时间、卡伦侍卫的来源，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作者特别提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 2000 余件与卡伦侍卫相关的档案，希望引起学界的关注。[③] 田宓、宋瑞晨则关注土默特社会的基层小吏领催，论述了领催的人选和职责，指出他们向下对接普通百姓，向上沟通蒙旗、道厅各级官员，是蒙旗社会非常活跃的中间群体，在维护蒙旗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对于清代文人群体的研究远少于个体研究，主要从某一侧面或视角对这一群体进行考察。诸雨辰通过考察清中期文人的诗文书写，分析乾嘉京城文人失落和焦虑情绪的来源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同时揭示京城生活如何激发了文人的使命感与傲岸人格，刺激了乾嘉时期文学及学术的发展与传承。[⑤] 王丁聚焦明末清初的文士画家群体，探究文人画的主体身份意识、文士画家的职业行为与心理、社会空间中的绘画观念变迁，并透过“以画治生”现象考察明末清初文士的历史境遇，而他们的体验与应对方式又进一步塑造了此时文士以画治生的特殊形态。[⑥]

本年的清代人物研究，既有对人物个体的深描也有对人物群体的综考，个体研究虽仍以高官名士为主，但从政务运作、思想流变、文献考辨等维度深入挖掘人物的不同侧面，尤其关注晚清官员与文人在时代变局中的选择与命运；群体研究则践行“眼光向下”的理念，通过司法档案、社会文书等史料还原其生存状态与社会角色，填补了小众群体研究的空白。

五、国家与社会：基层社会的管控与治理

清朝统治者一向重视基层社会的治理，2024 年基层社会管控与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既有宏观的国家治理理念研究，也有针对某一区域或某一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层社会运行实态等方面的理解。

（一）基层社会的治理理念

清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宏观治理理念研究。龙登高等考察了明清至近代中国基层治理体系的制度逻辑与转型路径，从土地产权制度的流转、民间组织对基层的间接治理、士绅群体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等方面，重构了近世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脉络及其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过程。[⑦] 贾安琪考察了清代“礼法合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指出清朝统治者通过“礼制下移”和“官法同构”两种并行不悖的制度建构模式，引导基层社会形成符合官方倡导的伦理道德秩序。[⑧] 林展通过对明清之际两位儒者陆世仪与陈瑚分别设计的《治乡三约》和《蔚村三约》进行对比，考察作为传统时代基层社会自治与管治重要形式的乡约制度，及其理论发展与实践之间的关系。[⑨] 温春来从清代矿业政策入手，揭示清廷与地方在资源控制、成本约束中的博弈逻辑，展现

① 陈俊、康文林：《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与出身构成》，《历史档案》2024 年第 3 期。
② 周云逸、王彤语：《清代太医外派地方医事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3 期。
③ 李阳：《清代边疆卡伦及卡伦侍卫来源》，《历史档案》2024 年第 3 期。
④ 田宓、宋瑞晨：《土默特的领催：清代蒙旗社会的基层小吏》，《安徽史学》2024 年第 1 期。
⑤ 诸雨辰：《乾嘉时期京城文人的都城体验与诗文书写》，《北京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0 期。
⑥ 王丁：《自娱之外：明末清初文士以画治生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 年。
⑦ 龙登高、陈月圆、黄一彪：《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 年。
⑧ 贾安琪：《立法设教：清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礼法合治”》，《社会科学》2024 年第 8 期。
⑨ 林展：《儒者治乡的理念与实践——以陆世仪〈治乡三约〉与陈瑚〈蔚村三约〉为中心》，《江海学刊》2024 年第 2 期。

清代国家治理中经济需求与统治安全的双重考量。[①]

具体问题中呈现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与方式。陈支平、吴晓非从西和县驿站月差章程入手，考察驿站差役的地方运行实态，揭示国家统治者、地方官员和基层乡绅民众围绕驿站差役展开的博弈，呈现清代州县驿站管理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②] 张振国聚焦乾隆四十年代初的磨改“违碍”碑碣浪潮，指出此系《四库全书》禁毁行为的延伸，相较于禁毁书籍，磨改碑碣将目标深入到社会最基层，是清朝思想文化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黄鸿山考察了清中后期育婴事业中出现的新型慈善救助模式育婴六文会，指出该会于乾隆末年从江西丰城扩展到全国，成为育婴堂制度的有力补充。育婴六文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地方大吏乃至朝廷的关注和支持，是清代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权共同推动的慈善事业。[④] 巫仁恕、吴景杰利用巴县档案中的盗窃类案件考察 19 世纪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迁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指出城市化、人口压力与社会动乱等导致盗窃案件频发，尽管清政府不断出台和修订律法以预防和惩戒日常犯罪，但由于时代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整个国家由上到下力有未逮。[⑤] 张天星关注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指出清朝统治者从维护正统思想、整顿风俗、社会治理、民族意识等动机出发，发起一波波禁毁小说戏曲运动，体现出清代基层社会文艺管理模式与观念变迁。[⑥]

（二）区域社会治理

对于某一区域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地理分布和所关注的主题也十分广泛，限于篇幅，以下仅以江南、华北地区为例，呈现清代区域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状况。

1、江南地区

清政府对江南的社会问题与地方治安历来十分重视，以各种方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之中。吕小琴关注明清两淮盐场的社会变迁，指出明中叶以来两淮盐场社会不断发生分化，国家控制力遭到削弱，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并有意识地吸纳盐商力量协助管理盐场社会，对两淮盐场社会的管理模式由此发生从直接控制到间接控制的转变。[⑦] 雷炳炎从康雍时期江苏州县行政入手，论述了清代江苏地方的建置变化及官吏役配置情况，以及州县行政中的流弊对地方政风、民生的影响，指出清代江南社会至康雍年间许多恶俗仍未得到根治，州县治理中也仍旧存在诸多弊窦。[⑧] 郑小春、李明啸从嘉庆十二年清廷专门针对徽州棚民问题而议定的章程入手，考察了徽州的土棚之争，指出清廷虽然对此十分重视，但该定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与地方实践严重背离，从中也可反映出土著、棚民与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⑨] 程宇昌从晚清至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的调解入手，考察国家权力、宗族势力、传统惯例等力量的相互博弈，呈现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水域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运作形态。[⑩]

江南系人文荟萃之地，文人士绅对基层社会治理起到重要作用，而清代江南文人与基层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一向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赵思渊考察了清代江南地方社会的“政治之事”，指出江南士人受经世之学的影响，将行政实务视作儒学经义与王朝政治的具体实践，而

---

① 温春来：《矿政：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② 陈支平、吴晓非：《驿站、州县与里甲纷争：以清代西和县驿站月差章程为中心》，《清史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③ 张振国：《秘密磨改碑碣与清乾隆朝的文化控制》，《史学史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④ 黄鸿山：《制度变迁与清代慈善事业发展——以育婴六文会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 年第 6 期。

⑤ 巫仁恕、吴景杰：《日常犯罪与清代社会：十九世纪中国窃盗案件的多元分析》，联经出版公司，2024 年。

⑥ 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中华书局，2024 年。

⑦ 吕小琴：《明清两淮盐场社会变迁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24 年。

⑧ 雷炳炎：《康熙雍正时期江苏州县吏弊与地方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24 年。

⑨ 郑小春、李明啸：《清代徽州棚民定例的制定与实施——以嘉庆十七年休宁县土棚之讼为中心》，《安徽史学》2024 年第 4 期。

⑩ 程宇昌：《晚清民国鄱阳湖区渔业纠纷调解中的传统惯例》，《学术月刊》2024 年第 6 期。

江南士人对于地方事务的讨论与实践，构成其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成为清代地方治理的特征之一。① 朱德印、郭院林关注同治年间金陵开展的雅集活动，指出该活动体现出士人关切现实，对国家恢复承平盛世的愿望和政治立场，对于战后江南地区的恢复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② 汤敏通过对四部明清《衢州府志》中秩序意识导向的考察，指出府志体现了官、绅、民多方力量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合作关系，对构筑缓冲地带、减少社会矛盾、平滑阶级对抗起到积极作用。③

清代江南地区人地关系紧张，土地和税赋的管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胡铁球、李新怡从《同治兰溪鱼鳞图册》中的“户名”记录考察清代基层社会的土地管理模式，指出鱼鳞图册的目标是维持土地原额，保证赋役原额不流失，领取地权凭证的人才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和承粮者，政府通过掌控这些信息，实现对土地和赋税的管理。④ 马琳考证了八卦洲由民地转变为旗地的过程，指出清代至民国年间，多方势力围绕八卦洲旗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互动与交涉，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国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混乱与动荡。⑤ 王日根、江俊皓以及杜志亚所撰论文，都关注了长江入海口沙洲地权的确立问题，前文从江阴常熟段入手，考察清至民国沙洲的开发过程，指出官府通过确立科则将沙洲纳入国家赋税体系，并在不断调整下使沙洲不同类型的土地得到有序开发。后文梳理了沙洲地权的确立过程与模式，指出生成性土地初始地权的确立与国家赋税制度紧密相关，其本质是人对新生土地资源占有的合法化，是国家权威下沉至未开发或正在开发地区的体现，而生成性地权主体的多样化是中央与地方统治力此消彼长的结果。⑥ 刘永华考察了清中叶以来徽州、赣西等地出现的图会、图局等组织，指出这些组织的兴起与周期性的赋役加征滥派乱象有关，体现了清代图甲职能的乡族化走向。图会的建立，让本无密切联系的人群为共同应对王朝国家对资源的汲取聚集在一起，体现了王朝制度对明清社会的型塑。⑦

2、华北地区

土地问题在华北地区同样受到关注。张力通过对清初山西荒地数字的考察，指出这些数字是统治者判断垦荒情形的重要依据，报垦也以此为基础展开。但雍正以前实际的垦荒数字与政府所掌握的数字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地方土地管理的复杂性。⑧ 胡英泽关注晚清山西各地相继开展的土地清丈与鱼鳞册攒造活动，指出这次活动形成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的土地登记与钱粮征收册籍体系，里甲体系也得到重塑，加强了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管理。⑨

民间信仰也是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徐春燕等考察了以华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城乡关系，从不同角度透视清代城乡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异常紧密的联系。其中，祭祀与庙会也是连接城乡、考察国家权力在其中影响的一个重要层面。⑩ 段建宏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阐释了民间信仰对传统社会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⑪ 王鹏龙考察了“官房”这一清代太行山中部村落用于春祈秋报、群祀众神或迎神的空间，指出官房作为当地乡民的一种文化创造，在民间信仰、娱乐交际和地方自治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⑫

---

① 赵思渊：《“政治之事”与清代江南的地方治理》，《清史研究》2024 年第 4 期。

② 朱德印、郭院林：《“中兴”想象：同治金陵雅集活动的现实关切》，《江海学刊》2024 年第 3 期。

③ 汤敏：《论明清〈衢州府志〉的秩序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24 年第 10 期。

④ 胡铁球、李新怡：《从“产权单位”到“纳税单位”：〈同治兰溪鱼鳞图册〉所载户名考释》，《浙江社会科学》2024 年第 2 期。

⑤ 马琳：《清末民初南京八卦洲的旗地纠纷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 年第 6 期。

⑥ 王日根、江俊皓：《清至民国长江入海口沙洲坍涨及其开发——以江阴常熟为中心》，《学术月刊》2024 年第 3 期；杜志亚：《清末民初长江河口沙洲地权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2024 年第 3 期。

⑦ 刘永华：《图局与图会：清代徽州图甲职能的乡族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4 期。

⑧ 张力：《清代前期山西省的荒地数字与垦荒进程新探》，《历史地理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⑨ 胡英泽：《晚清山西土地清丈与鱼鳞册攒造》，《历史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⑩ 徐春燕、朱宇强、田冰：《清代北方地区的城乡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 年。

⑪ 段建宏：《乡野颂歌：明清山西民间信仰与区域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24 年。

⑫ 王鹏龙：《官房：清代太行山村社祭赛与自治的新空间——以山西平定为中心》，《历史档案》2024 年第 4 期。

水利、交通等资源的开发与权利分配对于地方社会至关重要。郝平、张玮考察了作为“太行八陉”之一的井陉道在明清时代的交通建设，指出井陉道形成“五横十纵”的路网体系，官方机构、民间组织与宗教团体都融入到交通秩序的构建之中，共同推动了区域交通秩序规范的形成。① 王焕炎聚焦山陕基层水利治理实践，考察围绕水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形成的农民、基层水利组织、村落和政府间的复杂互动关系。②

本年度清代基层社会管控与治理研究呈现出层次分明的特点，在治理理念层面，既剖析“礼法合治”“乡约教化”等宏观治理逻辑，也通过驿站管理、碑碣磨改、慈善组织等具体议题，还原国家权力渗透基层的多元路径；在区域治理层面则从土地管理、治安维护、资源分配等维度对清代各地的基层社会治理实态进行分析，充分展现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互动的复杂性与灵活性。

六、结语

总体来看，2024 年清史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其一，宏观理论与具体实践相互印证。以“大一统”研究为例，既宏观阐释大一统观念的历史脉络、在清代的演进逻辑，也从经济、文化、礼法、民间信仰等角度对“大一统”思想的表达与实践进行论述，同时结合新疆“监督府”、东北厅制等个案考察“大一统”观念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具体实践，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态势，将该议题的研究真正推向深入。其二，更加注重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推动力。限于篇幅，本文未能对文献史料方面的成果单独总结呈现，但毫无疑问本年学界在史料发掘与整理上成果丰硕，既有海外珍稀文献的译介与研究，也有国内稀见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更有对满文档案、地方官修文书等史料的深度解读。同时，图像史料也愈发受到学界的重视，通过对历史图像的专业解读，并运用图文互证的方式极大丰富了历史认知的维度。其三，多学科方法与跨领域视角的融合日益深化。除传统的史学方法外，更多地引入量化分析、数字人文、民族学、地理学等跨学科方法，不仅为传统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也促进了交叉领域的研究，推动清史研究向更深入、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当然，本年度的清史研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如性别史、宗族史、法律史、城市史等以往较受关注的议题在本年度呈现相对低靡的态势，特别是性别与宗族史的研究，研究成果寥寥。究其原因，应为这一方面的新史料与新视角发掘不够，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减趋疲敝态势，亟待新鲜血液的加入。还有一些研究领域呈现论文与著作不均衡的状态，如“大一统”研究论文数量颇多，但本年度几乎没有相关的学术著作出版，法律史研究的总体数量尤其是论文数量不多，但学术著作却不少，以笔者所见，著作几乎与论文数量等同，体现出系统和宏观研究与某一方面具体研究之间的不均衡。最后，本年度对于小人物、小团体、小社会的关注虽然有所加强，但相较于上层人物与社会的研究还是远远落后与不足，也间接呈现了今后研究的发展空间与方向。

最后再次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力图以专题的形式呈现 2024 年度清史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并非全面梳理该年度的清史论著，在论述过程中的取舍与遗漏，还请学界与读者海涵。

① 郝平、张玮：《明清井陉道的交通建设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 年第 1 辑。

② 王焕炎：《明清山陕乡村水利治理中的制度、权力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年。